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刘璐, 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基本围绕内涵、渊源与传播、接受展开,兼涉该说本体及其形成、发展史,其研究态度、方法趋于理性成熟,整体朝精细化、深入化方向发展。论者多以“义理”为主轴,以“文章”为导向,认为此说有学科门类、治学路径、散文理论及“学术”之一体三面这四个维度的意义。“学问三分”体系是此说的远源,乾嘉学人的“共同命题”是其近源,姚鼐之后不同代际的文人学者对此说亦有阐扬。“义理考证文章”说由历代文人学者共同创造,意涵丰富,应选取概念史的视角,将此说置于散文理论史、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系统探讨不同身份、地域、阶层的个体及群体对此说的态度。今后研究应注重回归历史、文本语境,密切结合姚鼐的创作实践,以会通的视角深入发掘此说的内核与价值。

关键词: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回顾与反思;“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5)05-0503-08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researches of Yao Nai's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textual research with literary techniques in the new era

LIU Lu, OU Ming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Yao Nai's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textual research with literary techniques in the new era have achieved notable advancements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y primarily address the connotation, origins,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Yao's theory, and involve the ontolog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theory. The attitudes and methodologies employe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ational and mature, evolving into a more nuanced and in-depth approach. Scholars frequently focu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using “literary techniques” as a guiding framework, and they recognize Yao's theory's significance across four dimensions: its disciplinary category, academic approach,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its role in formulat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The system of “Knowledge Tripartition” serves as a distant source of Yao's theory, while the shared propositions of scholars from the Qian-Jia period represent its immediate source.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literati have further elaborated on Yao's theory, which has been collaboratively developed by scholars throughout history, embodying rich meanings. A conceptual history perspective could effectively situate this theory within the broader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ories regarding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academic thought, allowing for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attitude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from diverse identities, regions, and classes toward Yao's theory.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prioritize a return to historical and textual contexts, closely integrating with Yao Nai's creative practice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core and value of this theory from a convergent perspective.

Keywords: new era; Yao Nai;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textual research with literary techniques; review and reflection; Tongcheng School

收稿日期: 2024-1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64)

第一作者简介: 刘璐(2000—), 女, 安徽旌德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诗文。

通信作者: 欧明俊(1962—), 男, 安徽五河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散文学、中国古代词学。

姚鼐正式“命名”的“义理考证文章”说,是“桐城派”一以贯之的核心理论。本文时间范畴“新时期”指的是1978年以来的40余年。此阶段“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态势,不少文学史、散文史、文学批评史及“桐城派”研究专著对“义理考证文章”说多有讨论,海内外以此说为题的论文共计18篇,重点论及此说者达170余篇,但受篇幅及资料所限,本文主要以中国大陆地区成果为考察对象。此前学界已有赵必俊《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现代阐释》^{[1]2-12}、任雪山《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2]37-49}、秦威威《四十年来姚鼐研究述略》^[3]等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有一定回顾,但总体看来,梳理阐发有余,反思相对不足。本文拟对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以期深化“桐城派”研究、古代散文理论史研究、学术思想史研究。

一、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的动态考察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正式“命名权”虽属姚鼐,却是乾嘉之际文人学者共同关心的议题,三端之间的关系及座次是儒林、文苑争论的焦点。不同立场、身份的文人学人的表述多有不同,如戴震的用语为“理义、制数、文章”^[4],章学诚的表述是“义理、制数、文辞”^[5]“考订、词章、义理”^[6]等。姚鼐在《述菴文钞序》《尚书辨伪序》中表达为“义理、考证、文章”^{[7]61,251}。《复秦小岍书》中“义理”仍居于首位,“考证”与“文章”次序调换。^{[7]104}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陈用光最早将此说转写为“义理、考据、辞章”,《与鲁宾之书》曰:“姬传先生尝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8]曾国藩的学术宗尚和文学主张受姚鼐影响甚深,《圣哲画像记》曰:“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9]然姚鼐逝世时,曾国藩方垂髫之龄,他接受姚鼐之学是受到业师唐鉴的启发。曾国藩向唐鉴问学,唐氏恪守程朱家法,语之曰:“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

核,曰文章。”^[10]在师长的启迪下,曾国藩接受姚鼐正式“命名”的“义理考证文章”说,将其奉为主臬,但在论述时却将姚鼐的用语改造为“义理考据辞(词)章”。^①“考证”与“考据”相类,指汉学家法,即文献学功底,但姚鼐所说的“文章”并非现代学术意义上独立的“文章”或“散文”,而是指文辞,即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曾氏改造过后的“辞(词)章”既总指诗文,又指文辞创作技巧,较之于“文章”,范围更广。曾国藩的“误读”广为流传,造成后世表述上的差异,为还原姚鼐本意,本文使用“义理考证文章”说这一提法。^②

新时期“桐城派”研究渐趋繁荣,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也迎来新局面,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学界讨论热点多集中于此说的内涵、渊源与传播、接受。20世纪80至90年代可视为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重要成果约有50余项,特点是:以往相对简单的评价解读模式发生转变,研究整体回归学理层面,考察路径逐渐拓宽,研究态度趋于理性。不少学者注意到此说在散文理论、学术门径等多维度的意义,兼涉该说理论本体及其形成、发展史,为“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繁荣期的到来导夫先路。

新时期伊始,研究者不满于既往“义理考证文章”说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标签”,以客观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该说的内涵及价值。1979年,马茂元《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开篇便呼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桐城派”散文理论体系。文章史料翔实,评叙结合,乃新时期最早对“义理考证文章”说内涵进行解读的研究,论及该说在散文理论及治学门径层面的意义,虽未完全摆脱传统成见,但对突破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助益良多。^[11]1985年11月,在“桐城派”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桐城派”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海内外学者提交论文71篇,其中,石云孙的《义理·考据·词章》首次将“义理考证文章”说作为专题进行研究,论及此说的近源及调和“汉宋之争”的重要意义。^[12]

此阶段研究视角渐趋多维,不少学者将姚鼐

① 参见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② 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91页;王达敏《胡绳的文章论与桐城派的价值重估》,《文艺研究》2024年第8期。

“义理考证文章”说置于散文理论史、学术思想史中进行考察,对此说的解读更为立体多元。如钱穆在首版出版于1989年的《中国史学发微》中细致分析三端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此说多维度的意义,极具启发性。^[13]1992年,吴孟复于《桐城文派述论》中探讨此说不同学理层面的内涵,论证精当,言之成理。^[14]1998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辨析乾嘉考据学家的学术分类思想,深刻探讨清代以前及乾嘉之际“义理”“考证”与“文章”之间的争论,总结出乾嘉诸学者之说的共性与个性。该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厘清“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渊源颇有帮助。^[15]同年,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出版。^[16]¹⁴⁹⁻¹⁵²1999年,万奇《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问世。^[17]³¹⁻⁴³以上两部专著皆材料确凿、持之有故,从历时性角度对包括“义理考证文章”说在内的“桐城派”理论进行系统论述,较早从传播与接受角度探讨此说。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8]、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19]、王镇远《桐城派》^[20]、周中明《桐城派研究》^[21]等都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有所讨论,亦颇具洞见。

21世纪以来,“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进入第二阶段。此阶段特点为:研究数量呈爆发式增长,重要成果达200余项,研究队伍新老结合、不断壮大,专论“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成果涌现,重点论及“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硕博论文相继问世,整体研究呈复合式特征,朝精细化方向发展。

随着认识层面的深化,不少研究者立足文学本位,突破既定畛域,对“义理考证文章”说进行深度开掘,观点深刻、见解独到之作屡现。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辑录姚鼐佚文《复林仲骞书》,在乾嘉之际“考证”与“文章”之辨的复杂场域中,条分缕析地阐释“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理论实质及此说在姚鼐理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行文严谨扎实,论之有据,卓见迭出,发人深省。前人多有忽略的“文章”与“辞章”之间的细微差异,王著在注释部分也有分析。^[22]任雪山《桐城文论的现代回响》打破新、旧文学的藩篱,梳理、分析现代学术对“桐城派”文论的批评与转化,论及郭绍虞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创造性解读,论证细致精切。^[23]^{37-49,300-303}蒋寅《海内论诗有正宗——姬传身在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与渊源刍论》论及姚鼐

诗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分析“义理考证文章”说提出的大背景与小背景,还对乾嘉学人相近学说立论的侧重点进行辨析,令人信服。^[23]张德建《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历史建构》视角独到,不落窠臼,从学术思想体系角度切入,指出“义理考证文章”的学术系统以“文学”而主持“义理”,以“文学”而兼及“考据”。^[24]朱曦林《姚鼐〈述庵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通过对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释,探讨乾嘉之际“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25]赵建章《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26]、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学术流变》^[27]、吴建民《经学与桐城派散文理论》^[28]、程维《桐城派之义法与佛教》^[29]、蒋明恩《义理降格与桐城派末期文学的分野》^[30]等研究角度多维,涉及“义理考证文章”说,也有可圈点之处。

专论之作方面,罗书华《文化与文学:“义理、考据、文章”说的双重考察》认为“义理考证文章”说“一语双关”,深刻讨论此说在“文”与“学”层面的意义,指出此说是古典散文最后完成的标志。^[31]欧明俊《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爬梳“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远源、近源、直接资源、间接资源,并强调此说是清代学人的共同创造,姚鼐只是正式“命名”者,而非创造者,基本厘清此说的来龙去脉。^[32]贾宏涛《经学与文学的共振:姚鼐“义理、考据、文章”说申论》以《九经说》《尚书说》为例,将“义理考证文章”说纳入姚氏的解经实践进行考察,强调此说为“姚鼐结合经学层面对戴震的回应”,是“义理考证文章”说与姚鼐创作实践相结合角度的力作。^[33]

二、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内涵解读研究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内涵及“义理”“考证”“文章”三端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义理考证文章”说不仅是姚鼐的为文之旨,更是其学术宗仰。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重视此说在散文理论层面的作用,指出“考证”是为揭示“义理”,二者都是助成文章之美的手段。^[34]王镇远《桐城派》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说,姚鼐为调和“汉宋之争”,奉行程朱之道的同时注重经史诂训之学;从散文理论角度而言,“义理”是立言之旨,“考证”是确凿可信的材料,“文章”

是字句章法,三者相济,与“道与艺合”相通。^[20]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揭橥“义理考证文章”说的三层含义:“义理”指哲学,“考证”指科学,“文章”指文学,对应学科分类;“义理”指理论,“考证”指资料搜集,“文章”指为文之法,对应治学方法;“义理”指宋学,“考证”指汉学,“文章”指古文,对应学术流派。^[14]任雪山《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江小角等《桐城文派史》回归文本语境,任著认为“义理考证文章”说包含三个大的层面:学与行的关系、“学问”的三个层面及关系、如何写好文章。在第三个层面下,“义理”“考证”都是为“作文”服务的。^{[2]37-49}江著认为“义理考证文章”说是姚鼐学术思想的核心及文学理论的基础,“义理”一指普遍通行的道理,二指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物道理的“学问”;“考据”即考据学;“文章”在此处应指文学。此说一指三种不同的“学问”,是姚氏对儒家学术分类思考的结果;二指为文的三个层面,即理论、考据与修辞。^[35]纵观以上诸家所论,虽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理解有细微区别,但此说意涵丰富、具有多维度阐释意义基本为大家所公认。

“义理”“考证”“文章”三端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聚讼纷纭。认为三者兼济、相辅相成者,如程千帆于《阳湖文派研究》序中引其叔祖程颂万之言,曰“义理所以尽性,考据所以穷理,然非辞章则无以发其奥蕴,故三者相须而成”,并指出“义理考证文章”说与今人所述的真善美相合。^[36]强调“义理”者,如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重学之见解也。”^[37]突出“文章”者,如陈平原《文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文》指出,姚鼐站在文学家立场上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但并非平均用力,而是纳“义理”“考证”于“文章”,实现文质并举、理文兼至。^[38]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以“义理”为主轴,视“考证”为导向,二者与“文章”共同作为“学问”的一部分,相互补充,不可偏废。^[39]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回到历史场景,知其人而论其学,联系外部环境及姚鼐生平遭际、年龄变化等内部因素,深入挖掘姚鼐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义理”“考证”“文章”三端皆在

躬行之下,他以距离躬行的远近评估其在“学问”结构中的位次,“义理”离躬行为己最近,“文章”“考证”皆在“义理”之下。^[22]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与王运熙等对三端与“学问”的关系的阐发有一致性:论及“义理”是儒家经义,是道的层面;“考证”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一体三面。^[40]受“纯文学”“桐城文派”等观念陶染,现代论者多重视“义理考证文章”说在散文理论层面的意义,然而在传统“大文学”语境下,散文是“学术”本位,姚鼐视散文为“贯道之器”,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提出此说,认为“学术”包含“义理”“文章”“考证”。跳出“纯文学”藩篱,从“学术”这一更高视角审视姚鼐此说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不少学者结合现代学术思想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进行阐发,成果颇丰。钱穆《中国史学发微》认为此说一指“学问”门类,分别与文学、史学、哲学相对,一指“学问”成分,任何“学问”都包括“义理”“考证”“文章”三要素,并将该说视为治史的重要方法,指出“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13]刘进、涤生《义理·考据·辞章的现代学术方法论意义》^[41]、钟扬《兼容·兼济·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简说》^[42]、冯天瑜《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43]等亦有相关阐释。这类成果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作了创造性“误读”,在当下文化、文学语境中“接着讲”,为此说注入新的内涵,延伸了内在生命。

要之,新时期众学者所论各有侧重,多以“义理”为主轴,以“文章”为导向。综合诸家之见,“义理考证文章”有以下四个学理层面的意义:第一,指学科门类,基本与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哲学、史学、文学相对应;第二,对应理论、考据、文法三种治学方法或治学路径;第三,指散文理论,“义理”与“考证”的目的和归宿都是“文章”,具有指导文学创作的功用;第四,“义理”“考证”“文章”为“学术”的一体三面,是“学术”之下的子概念。姚鼐重视“义理”,兼及“考证”,同时不废“文章”,既调和“汉宋之争”,回应时代挑战,反拨学术流弊,又为文章之学张目。

三、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渊源与传播及接受研究

“义理考证文章”说渊源有自,非姚鼐独创。因该说具备经典理论特质,姚鼐之后不同代际的文人学者对其多有阐扬。新时期诸位学者继续上溯其源,下究其流,探讨该说的渊源与传播及接受,围绕这一论题各有斩获。

渊源研究方面,“义理考证文章”说有近源,有远源,有直接资源,有间接资源,是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创造。石云孙《义理·考据·词章》述评乾嘉儒林、文苑围绕“义理”“考证”“文章”之间的论争,涉及此说的近源。^[12]刘守安《姚鼐的文章论》简要述及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说是受程颐、戴震“学问”分类思想的影响。^[44]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梳理“文道论”发展流变史,将此说溯源至唐宋“古文运动”,兼论及此说的近源,强调姚鼐虽与戴震等“同言学问三事善用相济之道”,但其目的在为文章之学张目。^{[16]138-152}周中明《桐城派研究》重点论述“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近源,认为此说是黄宗羲、戴震、袁枚、章学诚等学者文人的共同主张。周著还基于各家立场,辨析其理论的侧重点,指出黄宗羲、戴震重在论学,姚鼐重在治文,与关著同样重视此说散文理论层面的价值。^[21]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回顾学术史发展、演进历程,指出“义理”与“考证”之争萌于先秦,成于两汉,分途于宋,而后详细梳理乾嘉之际学者文人的“义理”“考证”“文章”之辨,认为三者兼善是诸儒之理想,为便于观览,还将乾嘉诸学者之说整理列表。漆著不囿成说,析理透辟,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远源、近源皆有系统而深刻的阐发,为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15]万奇《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立论新颖别致,将“义理考证文章”说纳入作者修养论范畴,将其渊源上溯至先秦诸子,认为此说是方苞“义法”说的拓展。^{[17]31-36}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细致梳理、分析四库馆时期与乾嘉之际“义理”“考证”及“文章”之间错综复杂的学术论争,强调戴震是乾嘉学坛最早明确将“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途者,姚鼐、章学诚等多在其笼罩下运思,并指出姚鼐通过袁枚、章学诚“预闻并涉足”学坛“词章”与“考据”之辩,所论大有见地,是极有分量的专著。^[22]

欧明俊受王著启发,于《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中梳理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形成历程,指出姚鼐之前的历代文人学者对学术体系的阐发构成此说的学术资源;清中叶学者文人中,刘大魁、戴震的贡献最大,袁枚、章学诚也与姚鼐同时甚至更早做出各自独特贡献。^[32]

传播与接受研究方面,新时期部分论者虽有涉及,但整体略显零散琐碎,不够系统完整。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方宗诚、吴孟复等“桐城派”传人,对此说的接受备受学界关注。汪孔丰《姚莹“经济”说新探》分析姚莹自“义理考证文章”说发展而来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内涵及影响^[45];王达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城派》论及“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孟复将“义理”“考证”“文章”躬行于治学、治世中^[46]。曹虹《阳湖文派研究》^{[36]85-86}、杨旭辉《阳湖文派研究》^[47]、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文化》^[48]、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49]等论著同样有所涉及。

在“桐城后学”群体中,曾国藩对此说的改造更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万奇《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在爬梳此说渊源的基础上,述及“义理考证文章”说为方东树、姚莹、曾国藩所承继,衍生出“三本说”及“四学说”两条路径。^{[17]36-37}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梳理曾国藩、吴汝纶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指出二人因时因势而变,在师缘、业缘影响下,重新解释“义理”“考证”“文章”三端,并对此说进行阐发与改造,缓解思想文化领域对“桐城派”的种种压力。^{[16]152-166}刘来春《曾国藩对桐城派文论的发展》^[50]、李和山《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51]、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52]等专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代表文论的改造与创新。综合以上诸家之见,曾国藩受唐鉴的启发,秉持“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治学主张,于“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增添“经济”一端,赋予“义理”“经济”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为散文发展开辟新路。

综合看来,究其渊源,在“孔门四科”基础上由历代文人学者“层累性”创造的“学问三分”体系构成了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远源;乾嘉之际,袁枚、戴震、章学诚等人的“命题”构成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近源,充分表现出清代学术“集大成”的特色。考其传播与接受,姚鼐之后,

陈用光、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方宗诚、吴孟复等不同代际的学者文人对“义理考证文章”说或阐发,或增补,将此说躬行于治学、治世中。

四、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之反思与展望

新时期学界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将“桐城派”研究持续推进,直接推动“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的深入。在看到可喜进展的同时,问题与不足也同样存在,有必要对新时期的“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进行学理性反思。

(一)反思

姚鼐虽是“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正式“命名者”,但此论非其独创,而是在历代文人学者讨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在肯定姚鼐的突出贡献之时,也应尊重其他文人学者的诠释。作为“层累性”创造,此说正式提出后,经由后世论者或阐发或增补,最终成为经典命题。从动态角度爬梳此说经典化的过程,学界或可加强探讨。

传统“大文学”观念视域下,散文不仅是“纯文学”文体,同时也是“文章”文体,是超越“文学”的“文化”文体。姚鼐的“文章”观念是“学术”本位,他并非站在纯粹的“古文”立场上来宣扬“义理考证文章”说。此说具有学科门类、治学路径、散文理论等多维度意义,应充分予以体认。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多为个案且集中于曾国藩、吴汝纶等影响力较大的“桐城派”名家,未有系统的专论之作,整体流于零散、琐碎。从历时性角度而言,学界多将目光投向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在当代及后世的传播与接受,鲜有学者系统、深刻地论述姚鼐生前时人对此说的态度;从共时性角度而言,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接受、延续并非“桐城派”内部专利,不少非“桐城派”文人学人也有扬阐,在此说发展、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文人也应纳入考察范围。

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文本语境,姚鼐强调“躬行为己”,“义理考证文章”说与其创作实践关系密切。学界对此已有一定关注,但多“扎堆”于《登泰山记》这一山水游记名篇,不乏流于表面、陈陈相因之作,学界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研究尚未结合姚鼐整体的创作实践。

(二)展望

学者重学,文家重文,不同代际、不同身份的文人学人不断对“义理考证文章”说进行发展创新,该说的价值产生于历代文人学者的“建构”与“追认”过程中。学界可尝试选取概念史的视角,以更开放的思路,结合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深入辨析“义理考证文章”说在不同时期内涵、外延的演变,“全息性”还原该经典理论的经典化过程。

“义理考证文章”说具有多维度意义,不仅能指导文学创作实践,还可开示途辙,启发学术门径,更与真善美的操守品行相合。该说具备丰厚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及文化价值,其提出、形成、发展可折射学术思想史、古代文化史的发展演进,体现中华文化精意,是了解传统学术分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结构的一把钥匙,为当下学科分类、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与参考。应充分体认和挖掘古代“大文学”文章观念下,此说承载的丰富意涵。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形成、正式提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文学思潮关系密切。以此说为线索,能够纵横交叉地串联起一个时代,甚至整个文学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在联系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应注重扩大范围,注重挖掘式研究,集中考察不同时段、地域、身份的个人及群体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态度。“桐城派”内部成员因学术立场、文学主张、治生方式不同,他们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研究者需加以深入剖析。

学界应进一步搜集、发掘新材料,深入文本内部,宏观与微观结合,针对姚鼐生平及不同时期的具体创作展开细致分析,将“义理考证文章”说与其创作实践相结合,突破基础性、核心性的问题。古代散文研究不能脱离传统“学术”体系,在传统“学术”体系中,散文是“学术”本位,而非审美、抒情、艺术本位,散文只是“学术”总体的一面,是表达“学术”主张的载体。当下研究偏重姚鼐艺术性的文章,对其“载道”之文的讨论略显不足,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撰文探讨姚鼐的经学实践与“义理考证文章”兼济思想的关系,此类研究是拓宽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路径的可贵尝试。

学界宜扩大研究路径,加强各个角度的比较研究,如乾嘉之际戴震、袁枚、姚鼐、章学诚、段玉

裁等文人学人相近学说的异同比较,不同代际学者文人相近观点的异同比较,各家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比较,等等。

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学科划分日益精细化,跨学科研究成为新兴的研究模式和类型。相关学者借鉴各类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满足于就文学论文学,在充分体认该理论提出的“原生态”语境的基础上,将不同学理意义层面的“义理考证文章”说与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相结合,展示了会通研究的生机与活力。论者应立足文学本位,在深入了解这些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完善,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五、结束语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基本围绕该说的内涵、渊源与传播、接受展开,兼涉其理论本体及形成、发展史,研究态度、方法趋于理性

成熟,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均取得不俗成就,整体朝精细化方向发展。论者多以“义理”为主轴,以“文章”为导向,论及此说四个维度的意义:一指学科门类,对应哲学、史学、文学;二指治学路径;三指散文理论,“义理”与“考证”的目的和归宿都是“文章”;四指“学术”的一体三面。“义理考证文章”说有远源,即“学问三分”体系,有近源,即乾嘉学人的“共同命题”;姚鼐之后的不同代际、身份、地域的文人学者对此说亦有阐扬。“义理考证文章”说是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创造,具有多维度意义,承载着丰厚意涵。该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多为个案,学界可尝试选取概念史的视角,结合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文学思潮等因素,系统地深入探讨其经典化的过程。今后研究应注重回归历史、文本语境,结合姚鼐的具体创作实践,在充分体认该理论形成、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学理性探讨,以更加广阔的视角进一步发掘此说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 赵必俊. 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现代阐释:当代写作学的观照[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 [2] 任雪山. 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
- [3] 郭英德. 斯文:第11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215-240.
- [4] 戴震. 戴震全书:第6册[M]. 杨应芹,诸伟奇,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2010:373.
- [5] 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4:154.
- [6] 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5.
- [7] 姚鼐. 惜抱轩诗文集[M]. 刘季高,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8]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7.
- [9]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第14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86:250.
- [10]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第16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87:91-92.
- [11] 马茂元. 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C]//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96-324.
- [12] 石云孙. 义理·考据·词章[C]//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 桐城派研究论文选. 合肥:黄山书社,1986. 185-192.
- [13] 钱穆. 中国史学发微[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7-43.
- [14] 吴孟复. 桐城文派述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100-103.
- [15] 漆永祥. 乾嘉考据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0-230.
- [16] 关爱和. 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17] 万奇. 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
- [18] 魏际昌.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79-80.
- [19] 何天杰. 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M]. 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74-80.
- [20] 王镇远. 桐城派[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7-68.
- [21] 周中明. 桐城派研究[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235-241.
- [22] 王达敏. 姚鼐与乾嘉学派[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164-191.
- [23] 蒋寅. 海内论诗有正宗 姬传身在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与渊源刍论[J]. 文艺理论研究,2015,35(5):146-157.

- [24] 张德建.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历史建构[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111-121.
- [25] 朱曦林. 姚鼐《述庵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J]. 中州学刊, 2022(3):138-144.
- [26] 赵建章. 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93-95.
- [27] 曾光光.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86-90.
- [28] 吴建民. 经学与桐城派散文理论[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0(2):25-30.
- [29] 程维. 桐城派之义法与佛教[J]. 学术界, 2023(2):187-198.
- [30] 蒋明恩. 义理降格与桐城派末期文学的分野[J]. 青海社会科学, 2022(6):162-172.
- [31] 罗书华. 文化与文学:“义理、考据、文章”说的双重考察[C]//王水照, 侯体健. 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510-522.
- [32] 欧明俊.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Z]. 中国散文研究集刊(韩国). 2019:209-230.
- [33] 贾宏涛. 经学与文学的共振:姚鼐“义理、考据、文章”说申论[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7(3):59-68.
- [34] 成复旺, 黄保真, 蔡钟翔. 中国文学理论史:第4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7:286-287.
- [35] 江小角, 方宁胜, 朱杨. 桐城文派史:上册[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21:347-350.
- [36] 曹虹. 阳湖文派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 [37] 钱穆. 历史与文化论丛[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135.
- [38] 陈平原. 文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文[J]. 学术界, 2003(5):230-242.
- [39] 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227-228.
- [40] 欧明俊. “文学”流派, 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5(6):40-46.
- [41] 刘进, 涂生. 义理·考据·辞章的现代学术方法论意义[N]. 光明日报, 2003-06-25(7).
- [42] 钟扬. 兼济·兼容·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概说[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6):109-113.
- [43] 冯天瑜. 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J]. 人文杂志, 2018(4):60-68.
- [44] 刘守安. 姚鼐的文章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8, 12(1):95-100.
- [45] 汪孔丰. 姚莹“经济”说新探[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1(6):89-93.
- [46] 王达敏.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城派[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20:196-200.
- [47] 杨旭辉. 阳湖文派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64-102.
- [48] 曾光光.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M]. 合肥:黄山书社, 2011:101-104.
- [49] 萧晓阳.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266.
- [50] 刘来春. 曾国藩对桐城派文论的发展[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6(3):70-73.
- [51] 李和山.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8(1):69-71.
- [52] 武道房. 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J]. 文学遗产, 2010(2):136-146.

(责任编辑:王圆圆)